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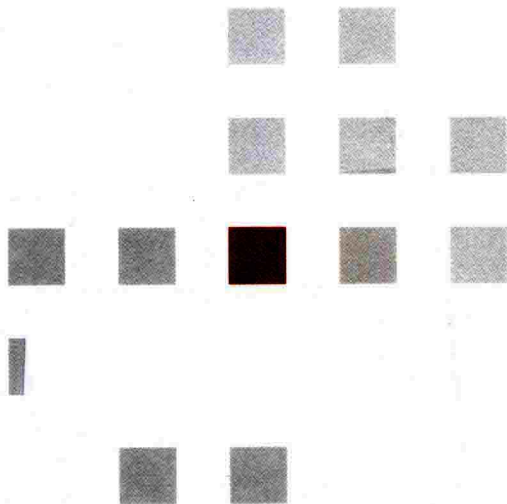


百家文库
BAIJIA WENKU

民族伦理文化研究

MINZU LUNLI WENHUA YANJIU

易小明 等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

民族伦理文化研究

易小明 等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民族伦理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反映一个国家或民族精神象征的历史文化积淀,是一个国家或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民族伦理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价值体系的核心。本书在探讨全球化条件下伦理发展问题以及从人的角度探讨民族伦理发展问题的基础上,以土家族、苗族伦理文化发展为案例,研究分析了民族伦理发展的自身历史逻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族伦理文化研究/易小明,等著.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3.1

ISBN 978-7-5667-0289-0

I. ①民… II. ①易… III. ①民族学—伦理学—研究
IV. ①C95 ②B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17977号

民族伦理文化研究

MINZU LUNLI WENHUA YANJIU

作 者:易小明 等著

责任编辑:王和君 责任校对:全 健 责任印制:陈 燕

特邀编辑:周小喜

印 装:长沙国防科大印刷厂

开 本:710×1000 16开 印张:17.5 字数:324千

版 次:2013年1月第1版 印次: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67-0289-0/B·77

定 价:35.00元

出 版 人:雷 鸣

出版发行:湖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湖南·长沙·岳麓山 邮 编:410082

电 话:0731-88822559(发行部),88822264(编辑室),88821006(出版部)

传 真:0731-88649312(发行部),88822264(总编室)

网 址:<http://www.hnupress.com> 电子邮箱:presswanghj@hnu.cn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湖南大学版图书凡有印装差错,请与发行部联系

目 次

第一章 全球化条件下的民族伦理文化

第一节 全球化条件下民族伦理文化的处境	1
一、关于全球化	1
二、全球化中的文化冲突与中西伦理文化差异	7
三、全球化条件下民族伦理文化的现实处境	27
第二节 全球化条件下民族伦理文化的发展	32
一、民族伦理文化发展的价值指向	32
二、民族伦理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	64
第三节 全球化条件下民族伦理文化的创新	71
一、关于伦理文化创新	71
二、伦理文化创新要把握好的两个基本关系	78
三、民族伦理文化创新的个体主体准备	93
四、民族伦理文化创新的基本准则	97

第二章 土家族传统伦理文化的特质

第一节 土家族历史与文化	105
一、土家族历史概述	105
二、土家族文化的演进	110
三、土家族文化的特征	124
第二节 土家族传统伦理文化的特质	151
一、土家族传统伦理文化的务实之维	151
二、土家族传统伦理文化的超越之维	162
三、土家族传统伦理文化的恒常与变易	177

第三节 土家族传统伦理文化的现代转型·····	193
一、转型中的优化·····	194
二、退化中的乡风·····	201
三、伦理文化退化的反思·····	204
 第三章 苗族传统伦理文化特质	
第一节 苗族历史与文化·····	207
一、苗族历史概述·····	207
二、苗族社会历史发展的特点·····	214
三、苗族社会历史发展诸特点形成的原因·····	219
四、苗族传统文化的特点·····	221
第二节 苗族传统伦理文化的特质·····	227
一、利益调节上的群体性·····	227
二、规范戒律上的自发风俗性·····	233
三、正义追求上的平等性·····	242
四、善恶评价上的他律性·····	251
第三节 苗族传统伦理文化的现代转型·····	254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趋稳定结构”特征·····	255
二、苗族传统文化的结构特征·····	256
三、苗族传统伦理文化的现代转型·····	259
 参考文献·····	268
后 记·····	273

第一章 全球化条件下的 民族伦理文化

第一节 全球化条件下民族伦理文化的处境

一、关于全球化

(一) 什么是全球化

关于全球化，目前有多种理解。一般来讲，全球化是指全球各民族国家之间的联系不断增强，全球意识不断生成，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在全球的规模范围内不断发展，国与国之间在政治上相互作用，经济上互相依存，文化上相互影响。

罗马俱乐部主席佩切伊在《全球问题研究的发端》一文中指出：“人类的历史进程已经走到一个重大的转折点，由于近几十年来在技术上取得了一些很不寻常的跃进，人类在过去年代所建立起来的联系的基础已经不再有效，它对自身、对同时代的人、对家庭、对社会和生活本身的看法，都必须深入地在全球范围内一一加以修正。”这一观点，很快被人们认同。1985年，奥多尔·拉维特在《市场全球化》中针对各国经济的开放程度、相互依赖性以及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一体化过程，首次提出了“全球化”概念，之后此概念便迅即在欧美学界得到广泛认可。1994年，联合国经合组织发展研究中心的欧曼将全球化问题扩展开来，提出要把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之问题在全球范围内一并加以考虑。1995年，美国全球化问题研究专家彪恩迪亚把全球化过程描述为市场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安全全球化三个主要趋势，认为第一个趋势是三个趋势中更基础性的趋势。他指出，全球化的基础是经济全球化，民族主权国家的经济被卷入全球市场，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经济

活动的各个环节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各国经济相互依赖性增强,呈现出整体化、一体化的发展态势。因此,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其实是市场经济的世界化,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冲破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越来越在广度上和深度上成为全球经济共同的运行机制,这个运行机制使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经济行为日益失去其基于历史的文化个性和地域特征,由此带来了资本的国际化、资源配置的全球化以及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世界化。

曾任德国总理的赫尔穆特·施密特在其1998年出版的《全球化——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挑战》一书中概述了全球化的一些特征:“在20世纪的发展进程中,在地球五大洲之间,在世界200多个国家之间的联系与接触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同时经历了巨大飞跃。总而言之,2000年的世界与1900年的世界有着很大的不同。这种差异要比1900年的世界与1800年的世界之间的差异大得多。现代交通技术的发展——不仅是飞机,还有集装箱船和大型油轮——现代通讯交往技术、现代贸易技术和现代金融技术的发展使世界发生了强有力的变化。这种发展在19世纪就已经加快速度,20世纪更是大大加快速度,特别是本世纪的下半叶。”^① 德裔英籍学者拉尔夫·达伦多夫在其1998年发表的《论全球化》一文中则从意识与技术方面分析了全球化的形成背景:70年代的生态危机,80年代的核武器辩论(特别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以后),使人们产生了全球意识。“信息革命把人类居住的整个世界变成现实的空间。从电话经过电子计算机到国际互联网的发展道路消除了人们的空间界限,这是以前的任何技术发展所无法实现的。”^②

德国著名的社会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在其1998年发表的《超越民族国家——论经济全球化的后果问题》一文中明确地把全球化理解为“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转变”过程,这一转变过程有四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国际贸易地域不断扩大,相互作用的密集程度日益增强;二是金融市场的国际网络化加快了资本流通,运动中的资本很难受其国家控制;三是在其他国家越来越多的直接投资基于跨国协调合作的发展;四是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国家的竞争压力增强,高新技术快速发展。^③

的确,全球化发展离不开技术进步。现代交通与通讯技术的发展,强有力

① 赫尔穆特·施密特:《全球化——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挑战》,斯图加特:德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6页。

② 拉尔夫·达伦多夫:《论全球化》,收入乌尔利希·贝克主编:《世界社会的前景》,法兰克福:祖尔卡姆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

③ 于尔根·哈贝马斯:《超然于民族国家吗?》,收入乌尔利希·贝克主编:《全球化的政治》,法兰克福:祖尔卡姆出版社,1998年版,第70~71页。

地推进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它使信息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准确、迅速地传递，广大的空间突然缩减，世界突然变小。特别是在今天，全球性交往已经实现信息化、网络化，国际资本以电子速度流动，经济交往的方式、速度和频率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全球化并不仅仅是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全球化，它同时也是政治文化的全球化。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全球化是全球化的基础，一切有关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问题的争端，都总是在经济的基础上展开，并可以从经济方面得到相应的说明。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依靠科技进步来有组织地扩大跨国经济的范围以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成为了现阶段全球化的主调。对发达国家而言，它们也许觉得，已经形成的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对它们更加有利可图，同时，开放的世界整体经济体系一旦生成，便不可能再封闭分散回去，于是，维护和发展这个体系就成为它们的一项基本政治任务了。

全球化发展的确带来世界主题的变化。黄树东先生在《选择和崛起——国家博弈下的中国危局》中这样写道：随着全球化发展，“新自由主义成了新的世界主流思潮，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追求平等和公正不再是国际政治生活的主流。什么新殖民主义，什么南北谈判等等，统统让位于全球化，让位于各国间的自由竞争。一个国家贫穷的原因不再是历史上的殖民主义，或现实中的不平等关系，不再是许多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发展中国家自己成了自己落后的唯一原因。解决现实世界的诸多不公正的途径，不再是调整国际秩序，而是全球化”。

上述观点也许有点片面，但人们思想意识中确实有那样一种转变，因此，全球化在某种意义上也就必然导致世界范围内的自由化。这样，关于公平公正实现的一般诉求被挪下了议事日程，代之而来的是新的思想、理论和信仰，但是，在我们看来，某种程度上的这种新的东西，不过是远古丛林原则的当代复现。表面看来，这种思想信仰是对一种自强精神的强调，因为它提倡每个人、每个群体、每个民族和国家，无论大与小、强与弱、贫与富，都必须自己帮助自己，自己拯救自己；但实际上，这种只关注现实差异而无视这种差异生成背景与历史条件的思想信仰，提倡的往往是强者对弱者的“自由”，资本对劳动的“竞争”，区别对待的正义原则在这里被抹杀了。

人们对全球化这一短暂的历史过程进行总结，认为全球化至少有这四个方面的问题：法制道义、损益难预、趋同求异、类群并立。

第一，全球化需要相应法制与道义的规范与支持。全球化是一个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也是一页崭新的历史，由于没有太多经验可以借鉴及相应文化的支持，全球化便表现出一些野蛮的特征。它必须以相应法律和道义加以规范和

引导,否则,它就有可能使所有参与其中的民族国家——不只是贫穷落后国家深受其害。我们知道,任何民族国家,其市场化的成熟都是随着法治及相应伦理文化的逐渐完善而完成的,没有相应法治、伦理文化的支持,市场就必然真成了原始丛林,丛林原则带来的不只是道德的无能,同时也带来经济的停滞和社会的崩溃,这是被历史所证明了的。但是,全球的市场化却并不是在优良法治与伦理环境下产生和进行的,因此,它也就必然内含未完善性、不成熟性,要使其完善成熟,国际市场的法治化、伦理化建设势在必行。但是,这些共同的法制、伦理文化建设,远非一国或几国之力所能实现,它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同时,这种努力也并不像在一国之内自上而下推行某种原则、规范那样简单,它需要不同文化之间通过平等商谈才能达到,因为在不存在强有力世界政府的前提下,任何一个强权国家要想通过非平等的强制方式将其民族文化推广为全球文化,都必将遭到其他民族国家的反对——就算其民族文化内含着某种普遍性,这种强推方式也是行不通的。因此,只要真正的世界政府没有建立起来,国际市场的法治化、伦理化建设就必然是一个漫长的磨合过程,它不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充分有效地得以实现。其实也应当如此,试想,当立法、司法和执法都归于一个或某几个强国,当伦理都只是对一个或某几个强国伦理原则的搬用,国际市场的公平至少在程序上就大成问题。至于其内容,存在利益偏向将无法杜绝,结果往往可能是强者的天堂、弱者的地狱。同时,这种法治、伦理文化就是抽象地建立起来,也只有那些最有能力从中获利的国家,才会认定它、执行它、尊奉它。

第二,全球化中国家损益错综复杂、难以准确预知。全球化是挑战也是机遇,是机遇也是挑战,在应有的合理规范还没有建立更没有完善的情况下,全球化中要判断谁必定获益或受损都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全球化前所未有而且主体利益错综复杂。无论是强国还是弱国、大国还是小国,它们在全球化过程中都有可能获益,也都有可能受损。传统中国在全球化伊始可谓是焦头烂额,但今天却又从全球化中快速崛起;大英帝国是在全球化伊始可谓长风破浪,但今天却又在全球化中不断衰落;就是美国,虽然一直在全球化中获益,现今却也表现出冷淡全球化的倾向,因为它开始感受到全球化中的代价。当然,这一些变化也许还有许多更加复杂或更加根本的原因,它们并不一定都是由全球化所引起,但毋庸置疑的是,它们都是在全球化中完成。全球化中强弱国家的快速转换之所以生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许多科学技术的“均匀”化渗透。在现代化过程中,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对于国家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掌握许多高科技的国家,其发展往往捷足先登。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不断打破国家壁垒,源源不断地向发展中国家发散,它们对于发展中

国家的发展产生了比对发达国家更加有效的推动作用，从而不断有力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跨越式发展。

第三，全球化中求同与求异并存。有人说，全球化导致的趋同是浅薄的，全球化导致的迥异却是深刻的。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也并非完全正确。我们认为，全球化其实是求同与求异共进的：某些方面求同，某些方面求异；有的求同消弭求异，有的求同扩展求异，有的求异消弭求同，有的求异扩展求同；并且求同中有求异，求异中有求同。因此，求同与求异的共进是全球化时代最深刻的特征。全球化带来了产品的规格化，带来了消费方式的同质化，但同时，全球化也带来了对民族生活方式的追寻与复归；全球化资本对所有的民族国家都一视同仁，但却又刺激了各种意识形态的兴起；全球化有强烈的人类的整体利益追求，但又带来了民族国家的利益冲突；全球化带来了世界杯，带来了普世文化价值，同时也带来了民族地方文化价值的复兴。

第四，全球化中类与族群精神共生，这也主要体现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共生。其实，类与族群精神的共生，也是求同与存异的一个重要的表现方面。近代以来，各种形色的国际主义都在全球化过程中生成发展，它们应时而现，都有自己的优势与不足。哈贝马斯认为，全球化对民族国家带来了巨大挑战，因为民族国家这一基本政治组织形式“在内部受到多元文化主义的强烈冲击，在外部面临全球化的挑战，在功能上越来越丧失其存在的基础”^①。但是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全球化同时也带来了更加强大的民族主义，带来了护照、海关和不同国家人们交往的阻隔，带来了国家疆界的森严和更加强大的国防。今天看到的“欧洲合众国”主义的兴起，欧洲统一货币的使用，欧洲边界的巩固，欧洲海关的确立，欧洲防卫的统一，它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国家界限的民族主义壁垒，却又进入了一个更大范围的民族主义樊篱，当人们把保卫国家安全的战场延伸到外太空时，谁还敢说全球化可能消灭国家疆界？

其实，客观地说，民族国家的主权、地位、职能等都在全球化过程中发生了变化，不承认这种变化是不行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及相应观念就已完全过时。国家作为人的一种群体生活方式，它当前以至将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为它目前仍然是世界利益划分的基本单元。当然，让世界仅仅停留在国家分离层面而不向上拓展到类统一层次，也许并不是人类的理想，因此，我们既不能因为国际主义热情而忘却了国家的现实利益，也不能因为国家存在的现实合理性而忘却了开辟它走向未来世界一体的广阔道路。

^① 章国锋：《关于一个公共世界的“乌托邦”》，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4页。

（二）全球化中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进程

经济全球化带来了文化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是指世界上的一切文化以各种方式，在求同与存异的共同作用下，在全球范围内的整合流动。有人认为，文化的全球化是指“超越本土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或者说倡导一种所谓的全球文化。全球文化的产生意味着一种超越国界、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普遍价值已经作为一种现实存在于世”^①。这样的全球化文化发展的确是一种事实。今天，在世界任何一家星巴克店，我们都能见到喝着美式咖啡，开着苹果IMac电脑，看着美国大片的各种肤色人种。我们正经历着或正参与着文化全球化的进程，文化全球化已经成为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

文化全球化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② 第一个阶段是文化全球化的萌芽阶段。从14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期工业革命之前是文化全球化的萌芽阶段。在这一历史阶段，欧洲现代文化在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中发展起来，并且由于地理大发现和殖民运动，出现了东西半球文化的第一次整体碰撞和接触。同时，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海外殖民扩张不仅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建立和发展，也导致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推广，而科学技术进步又促进了交通（体现为造船技术的进步）尤其是通讯技术的发展。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促使欧洲、亚洲、美洲、非洲文化的不断接触，于是文化全球化的号角开始吹响。但是，由于在工业革命之前，洲际国家的交往主要集中在作物、粮食、奴隶等的传输方面，除拉美外，欧洲对其他各洲文化的影响并不突显，交往范围也并未扩及全球，因此，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全球化尚未形成。

第二个阶段是文化全球化的形成阶段。18世纪工业革命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是文化全球化的形成阶段。工业革命之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范围内的扩展，文化的全球化也随之而来，因为一种生产方式的形成和扩展就是一种文化方式的形成和扩展。工业革命之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以及后来快速发展起来的德国和美国等，它们在亚洲、非洲和拉美一些国家和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殖民主义扩张，世界大部分地区被纳入了它们的势力范围，文化的全球化随之而建立。此阶段，由于交通和通讯技术获得了极大发展，文化传播速度当然更加快捷。尤其是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的快速发展，更是加快了信息传播速度，扩大了信息传播范围，正是在此基础上，“全球村”概念才应运而生。此阶段，跨国旅游、国际组织的建立等都有力推动了文化全

^① 蔡拓：《全球化与当代国际关系》，俞可平主编：《全球化的悖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132页。

^② 魏海香：《文化全球化历史进程考察》，《湖北社会科学》，2009年第12期。

全球化的发展。总之,18世纪末期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现代大工业生产方式的确立、启蒙运动的兴起,现代文化得以在西方确立,并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展而传布到全球各地,所到之处,快速引起了不同文化之间广泛而深刻的碰撞与融合,文化全球化正式形成。

第三个阶段是文化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今是文化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阶段。此阶段,全球范围各种文化的交往广度、速度等有了超常规的发展,产生了质的飞跃。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快速推进,文化全球化也便随之而来。在这一时期,国际分工由垂直式向水平式、综合式深化发展,跨国公司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建立,这些都有力推进了文化全球化的纵深发展。特别是通讯传播技术的发展为文化全球化的发展注入了一支兴奋剂。电话、电视、电影和广播的普及,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网络的出现,实现了文化的零距离传播,文化全球化真正渗透到了全球的每一个角落,随之而来的是全球问题的突显和全球意识的不断生成。随着现代工业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展,这种生产方式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也在全球蔓延开来,人们意识到此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呼吁全球环境意识、组织全球环境行动,于是,全球伦理、全球价值等被提上议事日程并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推广。

但是,文化全球化并不只是一味地求同,文化全球化还内含着存异,只不过求同的趋势可能压抑了求异的暗流而已,因此有人将文化全球化认作是文化同质化,这是片面的。而事实上,就是所谓的文化同质化,也并不是文化的所有层次、方面都同质发展,而往往只是某些大众文化消费的同质化,其他方面则不仅不同质,而且可能求异。因此,我们既要看到文化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大众文化消费的同质性,但又不能因此就把这种同质性夸大为文化全球化的根本或主要特征。

二、全球化中的文化冲突与中西伦理文化差异

(一) 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特征

文化全球化也就是全球文化的不断生成发展过程,全球化的文化发展呈现出如下一些特征。

一是文化的殖民化发展。经济全球化主要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推动的,因而,随之而来的文化全球化其实是西方文化的全球化。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凭借着自身在当代国际社会中的强势地位,自觉或不自觉地强行推销自己的文化产品及价值观念——这其间有些是同市场经济直接相关联的,而有些则不是直接相关联的,于是,其他国家文化遭到了西方文化的强制同化,这同帝国主义用

武力征服弱国的殖民本质并无二致，因此这就是一种文化的殖民化扩张。文化殖民主义其实是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的，经济领域成为殖民与反殖民的无硝烟战场。而在当前，表现最突出的是美国文化的殖民主义扩张。二战以后，美国的传媒业发展非常迅速，随着市场经济的全球化拓展，其媒体几乎覆盖了整个地球。一百多种文字的新闻在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中昼夜发布，于是，美国人的文化信仰、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也就随之传布世界各地，别国人民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地得到“熏陶”，从而逐渐对本民族文化及其价值观发生动摇，给各民族国家带来文化危机和价值认同危机，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①

二是文化的多样化发展。全球化的文化发展过程中，尽管一些主流文化是以西方国家文化为主导，但全球化的发展，既在文化多样化历史基础上产生，也在文化多样化的前提下不断升华，多样性始终是文化发展无法离弃的背景。随着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与深入，人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本民族的文化独特价值，“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在这里仍然展示着它的应有意义。各民族的文化意识开始觉醒，这加强了人们对本民族的认同感，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本民族文化的发展。正是基于此，各民族对殖民文化、霸权文化侵蚀越来越心存反感，从而增强了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认同与支持。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体现，是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识的积淀，是民族人生观、价值观的凝结，它反映了该民族的伦理观念、国民品性、思维方式等，因此，只要民族多样性存在，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就必然存在，并且民族文化多样性正是在世界商品规制统一化的浪潮中越发变得突显。事实上，随着文化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它们的民族文化传统并没有因此而消失，相反，它们都强烈地表现出依重自身民族文化的“本根意识”，这种本根意识在各式各样的国际文化交流中得以淬火。

总之，文化全球化并没有蚕食文化多样性，它在某些方面形成统一规范的同时，也激发了民族意识，升华了民族情感，强化了民族意志，重铸了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以文化自觉认同的方式得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空前提高。

三是文化的同一化发展。由于人具有类同一性，并且他们可能面对共同的生活环境，因此文化的同一性表现在横向比较与纵向发展过程中便都不可避免。考古材料证明，许多相距遥远且从未交往的民族，都表现出了一些相近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生活习俗，考古材料也证明了人类各民族都共同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历史阶段，这些都说明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其实有其内在的共同基础。

全球化条件下，文化的同一化发展非常突出地表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方面。所有的人类群体，其科学技术的发展都表现出由低到高、从简到繁的共同性，在这里，只能相同而不会相异：中国的勾股定理同毕达哥拉斯定理，焦耳与迈尔等的物质不灭定理，牛顿和莱布尼兹的微积分等，它们之间别无二致。^①

全球化发展还在其他一些方面促进了文化的同一化发展。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近些年来，一些欠发达国家在引进了西方先进生产技术设备的同时，也引进了大批的文化产品，肯德基、麦当劳、可口可乐、多媒体等具有象征意义的美国文化产品大批涌入。它们一方面改变欠发达国家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另一方面，也极大地冲击了欠发达国家的民族文化系统。它们利用文化交流中的绝对优势地位，将大量的文化产品倾销世界各地，使各国各地区的大众，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和认同美国等西方文化，导致人们对自身民族文化一定程度的怀疑和否定，从而导致各民族的文化独特性不断削弱，使之与传播者的文化不断趋同，这种文化的同质化现象，势必会严重削弱这些国家文化的自主能力。

当然，强势经济不等同于强势文化，强势文化更不等同于优质文化。人类学家路丝·本尼迪克特曾把社会分为“高协和”和“低协和”两种类型：高协和社会是优等社会，它的文化是安全的；低协和社会是劣等社会，它的文化是不安全的。在高协和社会，人们为了共同利益而互相合作，财富的分配更加合理均匀；而在低协和社会，个人总是通过战胜他人来获得利益，人们相互争斗，财富分配也是两极分化。由此观察，经济强大的美国，其所谓的文化“优势”并不与其经济优势相匹配，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一种高协和的文化。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也认为，美国其实只是一个混合性的协和社会，其文化因素有时往往相互矛盾，即它既有宽宏大量、十分安全的地方，也有一些习俗和制度使人们相互仇恨。^②可见，美国的强势文化中也有劣势因素存在，它要转化为优质文化，还有着遥远的路程。

（二）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冲突问题

我们知道，根据文化的结构和范畴可把文化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地说，文化指的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① 高静文：《在全球化进程中坚持先进文化》，《哲学研究》，2003年第4期。

② 参见（美）福兰克、戈布尔：《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它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三个方面。狭义的文化是指人们普遍的社会生活习惯,如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

从广义的文化角度来看,全球化也可以看作是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为基础的文化发展过程,这时,经济被看作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从狭义的文化角度来看,经济与文化这两个概念是不能相互包含的,市场经济与文化的关系也是如此。市场经济作为全球主要的经济形态,它一定与相应的文化发展密切相关。为了解开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既可以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理解文化,也可以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市场经济。如果以市场经济为理解文化的基点,那么,文化就可以划分为这样几个层次:一是与市场经济融洽的文化,二是与市场经济关联的文化,三是与市场经济几乎没有什么关系的文化。

经济全球化本质上就是交易市场的世界化,我们说这一过程本身就内含着一个文化构建过程,这里的文化就是指以上三种文化的前两个层面,特别是第一个层面。这一过程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科技文化在市场经济中茁壮成长。由于科学技术对于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在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在生产、交换、消费过程中,科学技术文化不断发展起来,这些科学技术文化揭示了生产对象的客观属性和工具系统的技术属性以及人自身的自然、社会属性,对于人的实践活动特别给力。二是,市场文化在市场经济中不断发展。这里的市场文化不是指以娱乐为方式、以赢利为目的的经营性商业文化,而是指从市场本身内生出来的体现市场运行机制与规律的相关文化。三是,民主政治文化在市场经济中不断发展。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相应的维护市场机制、保护市场主体基本权利的文化被建构起来。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是具有内在协同性的,市场经济是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民主政治是市场经济的政治保障。四是,在市场经济的主体适应过程中,建构起了彰显个体生存价值、追求自由平等的精神文化。自由平等是人的内在生命诉求,它当然也是市场经济主体的活动向导,可以说,自由平等就是市场经济的精神架构,没有自由平等精神,就不可能有市场经济的现实化运动。

以上几个层面都以市场经济的建立发展为内核。以建构、维护、推进市场机制的运作为目标的文化建构,都可以称之为市场相关文化。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讲,这种以市场为中心的文化,一方面要体现各民族国家传统的文化形式和相关文化内容,另一方面又得适应普遍市场的一般运作规律,具有普遍性。因此,新型的市场相关文化其实是民族传统特质文化与全球普适市场文化的有机融合,其中,市场规律统领着其相应文化的变革与发展。

但是,市场经济全球化、普遍化发展,并不意味着市场经济只能以某一种民族的强势文化为依托而在全球普及推广,它还可以以其他民族文化为载体而

运行,因此,市场经济全球化并不必然意味文化冲突就此销声匿迹,其深度的原因乃在于,文化并不能完全被市场、被经济所操纵,况且文化的发展特别是文化的差异化发展也有其内在规律。因此,无论市场经济在全球如何规划统一,文化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基础上可能生成的冲突都将永远存在,全球市场文化的冲突本质上是民族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

当今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大国强势文化与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冲突已是不争的事实,其本质在于,一个民族之强势文化的世界化发展是否具有足够的客观理由?西方文化是否能够直接演变为未来统领全球各民族的普遍文化?答案是否定的。道理很简单,就是同样的经济模式完全可以由不同的文化形式去执行、去实现,而这些文化形式,除了推动经济发展之外,还有更加根本更加重要的人生价值指向,当经济效益与其基本人生价值取向相矛盾时,他们就不可能为追求经济效益而放弃自己的传统文化精神。

但是,已形成的经济全球化,其文化的演变基于这样一个机理:目前有利于市场机制的文化体系可以说基本上是在西方国家的文化系统中孕育、发展和成熟起来的,它们的根都在西方文化之中,它们内在地表现着西方文化的种种特质。虽然市场仍然是统一的市场,但运行市场的文化却是各民族文化,其中包括民族传统文化,而西方文化并非与所有的民族文化特别是民族传统文化完全通融,因此不同文化之间甚至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冲突都在所难免。特别重要的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有明显优势,它们不仅想而且能够把市场运行机制及相应的文化体系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推行起来,在这一过程中,它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当今能够推行市场机制的文化直接等同于传统西方文化,这样,它们在把经济全球化演变为市场文化的全球化的同时,又将市场文化的全球化演变为西方文化的全球化。

全部问题的根本在于,市场文化是否就只能西方文化,或市场文化的根是否只能埋在西方的传统伦理文化之中?如果只能如此,那么要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西方文化的全球化便不可避免。可是,有事实说明,市场经济不仅可以而且还能较好地非西方的其他文化土壤中生长壮大,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崛起就是明证。

正是基于以上缘由,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发达国家的积极单边推进,欠发达国家总是处于一种被动适应的地位。它们不仅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而且付出了沉重的文化代价,如果它们的传统伦理文化有能力运载市场经济,那么西方文化的全球化遭到这些民族国家文化的反抗就成为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这就是当今人们非常关心的“后殖民问题”,正如印度裔批评家伽耶屈·斯皮伐克所指出的,“后殖民”不是指一个地域区别的概念,也不是一种

思想潮流，而是指一种新的世界格局；“后殖民”这个概念能够表述一个不同于旧资本主义却又与之相联系的新国际资本主义。

压迫与反抗并存，有后殖民就必然有后殖民批判。后殖民批判所批判的是，第一世界通过国际资本实施对第三世界的压迫和控制的方式来把握当今的世界秩序，它的矛头主要并不是直接指向作为经济体制的资本主义，而是特别注重西方通过知识话语对第三世界的控制，其中尤以推行西方的现代发展观为甚。后殖民批判认为，以客观普遍的知识话语面目出现的西方意识形态，使得殖民主义能以不断变化的形式延续至今，并能为维持西方的控制及其知识权力结构而不断生产和再生产与之相适应的殖民主体。后殖民批判把主要关注点放在西方话语对欠发达国家主体、文化身份和历史进行控制的建构上，这些建构使得欠发达国家因无法形成和表述自己独立的主题和历史意识而不能不屈从于西方意识形态，从而成为西方政治和文化上的“被压迫者”。

当然，西方发达国家对世界欠发达国家的话语控制，并不只是简单地将西方观点强加给这些国家，而是借用通用的科学话语形式来有效地消解容纳其中的任何反对意见，从而使反对意见本身成为它的容纳性和客观性的证明。诸如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哲学、文学等这样的系统话语形式，不仅本身就是西方的，而且还被等同为普遍的客观性知识。在它们所形成的强大的话语支配领地中，欠发达国家的文化和知识不能不处于屈就和边缘的地位，自然也就无法伸张与西方话语平等的合法性。

我们可以以平等的观点看待文化横向比较的差异，但我们却不能简单地以一种平等的观点看待文化的纵向历史发展的差异——如果文化的演变确实存在着一种统一的内在的进化发展模式的话。合理的、先进的文化是不是应当以人的解放、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而人的解放，包括物质压迫的解放和精神束缚的解放，于是为解决物质问题就推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为解决精神问题，就有了自由平等的价值诉求。在近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西方文化确实在人的解放方面彰显出它的意义，可以说，某种意义上它牵动着人类文化的发展进程，因此，西方文化对人类文化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文化的纵向发展差异并不能完全否定文化的横向比较差异，如果如此，那就是以文化的时间差异来消解文化的空间差异，这必然导致文化的片面畸形发展，因为文化并不是一个可以离开空间条件的纯粹的历史进程，它是一定空间、一定现实环境条件下人的现实活动的产物。因此，当西方文化以一种历史的必然性来消解民族文化的区域特质时，它就犯了一个以文化历时性消解文化现实性的巨大错误，它也就超越了它应有的“职权范围”。反过来，一旦其他民族文化仅仅以自己的区域特性来对抗甚至瓦解西方文化的历史优势时，